

新闻学与传播学名家论丛

传播与社会： 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

赵月枝 著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新闻学与传播学名家论丛

传播与社会： 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

赵月枝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赵月枝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657-0223-5

I. ①传… II. ①赵… III. ①传播学:政治经济学—文集

IV. ①G206-53 ②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2170 号

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

作 者 赵月枝
特约编辑 王维佳
责任编辑 赵丽华
责任印制 范明懿
封面制作 魏 东
出版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21.25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657-0223-5/G·0223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序言：我的跨国学术，我的跨国体验

1986年，在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背景下，我以公费留学生身份“出国”，赴加拿大攻读传播学硕士学位。出于对西方新闻学理论前沿的无知和对英文阅读的不自信，我箱里装着《报刊的四种理论》的第一个中译本。这本冷战时期的美国新闻理论经典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供批判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之用的名义在国内内部出版。由于当时我们自己可作为其批判武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已失去了权威性和说服力，而我又根本不知道可作为批判此书之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其他批判理论早已在西方学界流行，所以，我不仅多多少少从接受的角度来阅读这本书，并且假想这本书还作为西方大学的必读教材使用。然而，我的“第三世界”国民身份又使国际传播秩序的不平等问题萦绕于心。于是，我又带上了作为“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成果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中文版。这两本随我出国的书，冥冥之中把“自由”与“平等”这两个主题放入我的理论视野，而我当时从一个社会主义的东方民族国家到一个资本主义的西方民族国家的“出国”旅程则意味着，我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离不开对东西方关系、民族国家范畴，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一对相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概念的审视。

1997年，在美国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劳工政策背景下，我又一次“出国”——离开加拿大这个我已经获得其公民权的国度，去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传播系任教。在信息化资本主义时代的国际劳动分工中，作为“跨国知识劳工”，我是被美国当做“有特殊专长人才”引进的。我是H1B签证的持有者，在美国的正式身份是“合法异族”(legal alien)——虽然我是地球人，但是英文中的“alien”一词总使我首先想起“E. T.”一类的外星人。当时，我的 *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 (《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 和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中国的媒体、市场与民主》) 这两本英文著作即将分别在加拿大和美国出版。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尝试用中文写作学术文章，希望自己能成为中文学术共同体中的一员。不过，出于教学与出版英文著作的压力，当初我自己定下的目标是一年发表一篇中文文章。所以，10多年后，当我发现，除了《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的两个中文版本(2005, 2010)外，自己已在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发表了40余篇各类中文文章时，还是十分高兴的。本书收集

的18篇文章中,有12篇是已发表的中文文章的修订版,其他6章是第一次用中文出版。^①

本书分为四编。第一编提供理论视野。第1章是有关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发展轨迹、分析路径、主要作者及其观点和当下研究前沿的概述。第2章对1980年代的文化批判理论,尤其是“后学”一些主要流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的意识形态范畴的新批判,进行了梳理与评价。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作为“批判的武器”的相关性同时,批判地吸收“后学”对媒体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理论贡献。以第1和第2章的理论探讨为前提,第3章进一步引入从“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到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公共领域”概念的重构等当代社会理论资源,结合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传播问题,从全球角度和批判理论视野来审视中外传播中的社会权力关系。这一章旨在使政治经济分析与文化分析相结合,力图在动态的社会历史分析中,构建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性学术视野。

本书第二编,“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收集了我对“中国以外”的“西方”和“中国之上”的“全球”传播的一部分研究。在这一编的6篇文章中,有一半是我自己的个人文章,有一半是我与罗伯特·哈克特(Robert Hackett)的合著。不过,就第9章而言,我的补充和修订已在内容上与英文原版有不少区别。从第4章对1991年美国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中美国报界新闻话语的细致解读和对美国主导文化迷思的解构,到第7章对2002年美国电信业危机的评述;从第5章有关北美新闻客观性与可持续民主的讨论,到第9章有关传播全球化与民主化复杂关系问题的疑问,这些文章体现了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一些基本思路。在第8章里,我引入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2000)的“帝国”概念,讨论了当下世界传播中,国家、资本和非政府组织力量的重新布局。基于此,我把这一编定名为“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不过,我要强调,任何有关当下全球结构的社会分析范畴都有其局限性。在这样一个巨变的年代,保持分析的开放性和不同分析范畴间的对话和相互补充最为重要。

邓正来教授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传播学》(2009:10)一文中写道,当下全球化的世界蕴含着“结构性的不平等”,形成了“世界结构”。而且,“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在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进入世界体系以后,我们所关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孤立的中国,而是一个世界结构中的中国。对于中国来说,这才是三千年未有之真正的大变局”。事实上,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被洋枪洋炮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了。如我在本书第13章和第14章所论及,改革开放和以加入WTO为重要里程碑的加入全球化的进程,是中国在经历了1949年的社会革命后重新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不过,正是在邓正来教授所说的中国所参与“世界游戏”的“世界结构”是不平等的、“蕴含着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的结构性支配”这一层含义上,我把第三编

^① 有关这些文章的详细出版资料,见后记。

定名为“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传播”。这一部分包含了有关中国传播在制度变迁和话语呈现方面的一系列论文，包括中国加入WTO这一事件在媒体话语和传播结构层面的分析。这一编始于第10章有关报业结构转型的分析，结束于第15章围绕信息传播技术的有关中国宏观发展道路的讨论。

本书最后一编由三篇文章组成。在这些文章中，我从国际和国内、国家和社会、政策和文化、主导性力量和挑战性社会力量、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层面讨论了当下中国和全球传播领域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一编的标题，“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是世界性的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社会正义运动的一个口号。它是针对新自由主义语境下的“历史终结论”和“没有它择”的“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之说提出来的。在第16章中，我讨论了“信息社会世界峰会”通过信息传播技术解决世界结构中的不平等问题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在第17章中，我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问题进行了历史回顾和现实分析，并讨论了与文化多样性问题密切相关的中外进步社会力量为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和追求替代性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多种努力。在本书结尾的第18章中，我进一步引入当代激进认识论和去西方化社会理论，以世界结构中的中国社会传播和中文传播学术的理论主体性问题为主要观照，提出了当下传播研究的理论新面向问题。从本书的结构角度，把这一章作为结尾，彰显了从理论讨论到传播制度、话语和政策研究再到理论知识与传播实践相结合的分析路径。同时，通过第一编中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梳理到最后一编有关“南方认识论”的讨论，我希望本书体现东西方和南北方在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中共同探索的自觉文化意识和批判世界主义的学术理念。

这些文章的写作语境不同，论题各异。由于诸多主观和客观原因，成书过程前后经历了六七年之久。在编辑成集时，对有些文章，我进行了大量修改，以期在不改变基本分析框架的同时，尽量观照最新的理论讨论、文献发展和时事变化。例如，对在理论构建方面起到提纲挈领作用的第3章，我在200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和补充。但有些文章，尤其是第二编和第三编中的许多文章，由于其内容本身有很强的历史阶段性和描述性，我只在文字上进行了一些处理。在编辑中，我强调观点的相关性与文章的可读性，在有关国内外媒体的发展和政策变化方面，我没有刻意追求资料上的新颖性和时效性。此外，在尽量删除不同文章对相同观点和事例的重复时，我突出不同章节之间的相互印证和连贯原则。我希望，本书不是已出版文章的大拼盘，而是一部有内在逻辑和关联的研究著作。

不过，我不能说本书汇集了我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比如，基于我的两部有关中国传播问题的英文专著的许多英文文章，未曾有机会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当然，更不必说这两部著作本身了）。事实上，这两部著作最直接地反映了我希望与其他中国传播研究者进行学术对话的努力：在1998年出版的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一书中，我质疑把“市场”与“国家”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通过对中国社会内部复杂传播政治经济演变过程的动态历史研究，挑战了当时流行于国内外中国传播研究中有关市场化如何会带来

民主化的简单线性分析。而在有关市场和国家“共谋”的市场威权主义制度分析框架在新世纪初又几乎成为新的简单化分析框架的时候,我致力于开拓中国传播研究的社会历史深度。因此,在2008年出版的 *Communication in China* 一书中,我在突出政治经济分析以及市场与国家之间在传播领域的复杂相互构建关系的同时,强调了“中国革命遗产和社会分层、尤其是社会抗争,对分析中国传播问题的核心意义”。而相对于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一书对中国内部问题的重点关注, *Communication in China* 有了更多的从世界结构中把握中国传播问题的学术自觉。从某种层面上看,我所有的中英文著作都好像继续与装在我当年出国行囊里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和《多种声音,一个世界》进行着某种对话。

在学术取向层面,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我的努力的话,我想这个字应该是英语中同时可以作名词和动词的“桥”(bridge)字或与桥相关的“跨”(cross)字。我希望,我的基于动态社会历史的整体性分析路径能使我跨越一系列不可避免的二元对立: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主体与结构、压迫与解放、民主与专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公共性与阶级性、新媒体与旧媒体、新闻与娱乐、新闻研究与传播研究、媒体研究与电信研究、批判与建设、主流与另类、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等等。虽然这些二元对立是现实存在和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希望,我的分析是三维的或更多面向的。同时,在分析中,我对一些不但没有建设性而且可能隐藏着话语霸权动机的简单化等同逻辑保持警觉,包括把市场等同于自由(“自由市场”),把“自由市场”等同于民主圭臬,把消费者等同于“人民”,把“中产阶级”等同于民主主体,把国家等同于压制,把媒体规制等同于威权,把“新闻自由”等同于“私人办报”,把批判知识分子等同于国家主义者,把反帝立场等同于民族主义等等。

虽然当下流行的中产阶级专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宣称是把个人生活体验与学术分开——就像本书第5章讨论的“新闻客观性体制”要求记者把自己的主体性从新闻报道中隐去一样,但是我相信个人因素与学术研究的相互构建关系。在我以这本集子就教于中文学界同仁时,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做自我异化的学术。我更聊以自慰的是,我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个体的内在志向的统一。就像我的学术生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世界历史进程紧密相关一样,这部集子所包含的跨国学术与我的跨国生活体验密切相连:当年,我离开在温哥华的家人,在美国南加州写成我的第一篇中文学术文章;去年,我在把家人送回温哥华后,在北京完成了这部中文文集的编辑工作;今年,我又在弥漫着中国春节气息的温哥华起草这篇序言。当年,是中国和美国的人才和劳工政策使我得以到加拿大求学和去美国求职;现在,是加拿大和中国为增强本国学术能力而各自设立的国家人才计划——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计划和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使我有更好的条件从事我的跨国学术活动。

从南加州圣迭戈有南欧情调的生活世界,到温哥华越来越有中国情调的生活世界,

再到北京充满着欧美情调的生活世界，我深切感受到，我书中所分析的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逻辑——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论的“系统世界”，对我个人生活现实性的构建力量。当我面对我那因生活所迫而在身体骨骼还没硬朗就去建筑工地抬超长超重的水泥板，结果留下永久腰椎伤的弟弟的时候，当我看到“留守儿童”经历在我外甥的主体性形成过程中留下巨大阴影的时候，当我听着我妹妹含泪言说她对“留守儿童”儿子的亏欠的时候，我都深深认识到，没有人生活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逻辑之外。每个主体都被这个过程构建着。

然而，任何一个主体又不仅是能动的，而且是社会的和与人类生活共同体中的其他主体相互依存的。学术使我在“系统世界”中安身立命并与之相互构建；学术也使我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生活世界”，从而追寻与实现生命的价值意义。1977年，在高中教育机会十分有限的中国农村，我曾因为自己学习成绩不错而被剥夺了参加初中升高中考试的资格。这是因为，如果我被允许参加考试，而且哪怕择优录取的原则发挥一点作用，就意味着我很可能会占去一个村里权势阶层希望留给自己子女的有限的高中名额。是我母亲和两位有正义感和社会公平意识的年轻民办老师的抗争，使我有资格并最终获得一个“额外”的高中入学机会。在1980年代的“伤痕文学”和主流“文革”叙事中，主人翁们总是因为政治运动或“阶级成分”不好而被剥夺了他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权利和在城市社会的生活。我生于农村，当然没有资格谈“失乐园”。事实上，部分正是因为我的家庭“阶级成分”太好——无权无势的“贫农”——我才没有获得参加考试的权利。我的个案是特殊的。在“血统论”早已被批判过和庸俗经济决定论早已被扬弃的当下，我更无意在任何个体的社会身份与批判学术理论取向之间建立什么必然的联系：不少批判学者生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精英之家，而那些信奉新自由主义教条并漠视新的阶级不平等的学者群体中也不乏工农子弟。但是，没有什么体验比我的求学经历更使我对制度的许诺与实际权力操作之间的普遍张力更刻骨铭心了。更没有什么体验使我更深刻意识到发展、权利、社会进步、资源分配、机会平等、程序公正、结果平等、赋权、抗争等一系列学术概念的现实生活含义了。此后，求知路上，我以知识的解放性为价值，以学术的公共性为天职，力图通过既能表达个人主体现实性又能体现自我反思能力的特定知识建构进入学术公共领域。

我所追求的学术理想是抽象的、乌托邦的，也是具体的、现实的。它来自我在学理上的求索，它也根植于我的生活世界。在我从事学术实践时，我会调用各种理论、概念和方法，我会以真诚和严谨的态度对待我的研究资料，我还会想到我的日常生活体验和我身边人们的命运，包括我个人生活中两个最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个体：我那从未谋面的外祖父——他在60年代初死于饥饿；我那在偏僻山村因看不到生活的希望而在80年代末自杀的表妹——她自杀时的年龄正是我出国留学的年龄。我常常问自己，我的学术与这两个人的命运有什么关联？我也常常会想到，我的学术和我的跨国知识分子身份与那些没有机会上高中，没有机会上大学，没有机会出国的群体有什么关联？我更会考虑，我的

学术与我那些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不同生活体验的不同肤色的国外同事、学生以及他们的国人有什么关联?当然,在编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想得更多的是,我的学术与处于日趋激烈的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之中的中文学术界及其所观照的、正在经历巨变的中国社会,有什么关联?正是在这样的活生生的、幸福与苦难共存、包容与排斥并进、希望与危机同在的具体社会历史关系和学术政治场域中,我尝试着构建我的跨国学术公共性。

吕新雨(2011:69)指出,随着中国改革再次走到历史抉择关头,如何重新思考学人在日趋复杂的学术与政治关系中所坚守的学术立场,如何确立学术伦理和建立学术规范,学术共同体如何保护学术自由和以此为基础的思想辩论等等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每一位严肃的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现实存在”。她呼唤“诚实”而“正直”的学术伦理,并以此“重铸和激励知识分子对社会守望的职责和信念”。她写道:“在这个严峻的历史坐标点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已经狂飙落地,再次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任重而道远的历史天命。”

作为一位海外华人,我深知,我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密切相关;作为一名跨国知识分子,我深信,中国的抉择事关世界的未来。谨以吕新雨的以上言语与那些有心阅读随后章节,并愿意与我进行真诚学术讨论的学术共同体学人共勉。

目 录

contents

序言:我的跨国学术,我的跨国体验 /1

第一编 理论视野

- 第 1 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渊源、研究路径和学术前沿 赵月枝 邢国欣/3
- 第 2 章 意识形态的再次终结? ——后现代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概念 /21
- 第 3 章 国家、市场与社会: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分析的基本立场 /32

第二编 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

- 第 4 章 挑战主导叙事:海湾战争中的和平抗议与美国报章的意见/社论话语
罗伯特·哈克特 赵月枝 /61
- 第 5 章 道德改革的局限:论新闻客观性与可持续性民主 罗伯特·哈克特 赵月枝 /87
- 第 6 章 公共利益、民主与欧美广播电视的新自由主义化 /102
- 第 7 章 全球电信危机和产业重组的困境: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破产——一位美国学者的分析和警示 /124
- 第 8 章 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走向国家、资本和非政府组织力量的重新布局? /129
- 第 9 章 媒体全球化与民主化:悖论、矛盾与问题 赵月枝 罗伯特·哈克特 /145

第三编 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传播

- 第 10 章 从商业化到集团化:中国报业在 1980—1990 年代的转型 /167
- 第 11 章 中国电视:历史、政治经济与话语 赵月枝 郭镇之/181
- 第 12 章 有钱的、下岗的、犯法的:解读 1990 年代中国的小报故事 /191
- 第 13 章 “入世”:全球化、强国梦与中国报刊关于 WTO 的话语 /210
- 第 14 章 中国传播产业与“入世”:一种跨文化政治经济学视角 /229
- 第 15 章 手机之后,是什么? 中国“数字革命”的社会层面再认识 /243

第四编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 第 16 章 一个世界峰会与一部中国电影:“信息社会”的多维景象 /259
- 第 17 章 文化产业、市场逻辑与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文化传播理论与实践 /263
- 第 18 章 “向东看,往南走”:开拓后危机时代传播研究新视野 /280

参考文献 /296

后 记 /325

第一编
理论视野

第 1 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渊源、研究路径和学术前沿

赵月枝 邢国欣

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学研究可以说是异彩纷呈,流派有别。起源于美国的实证学派,重点在于媒体分析、受众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等层面,它在美国传播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在欧洲一些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也由于美国的文化与学术霸权地位而拥有很大的影响力。然而,就像美国的商业广播电视制度并不能代表世界广播电视制度的多元模式一样,美国的实证学派并不代表世界传播学研究的全部。起源于法国、主要研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和语言的象征再现功能理论的结构主义派别,起源于德国、集中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商业化体制下的文化工业以及资本的文化统治本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起源于加拿大、主要关注传播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多伦多学派,都对传播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传播学研究中另一个独特的流派。这个流派完全有别于美国的实证学派,它着重分析传播体制的经济结构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过程,从而揭示传播与文化工业的复杂性,以及通过资本实现的传播与文化活动对社会过程的影响。通过对传播的所有权、生产、流通和受众消费等层面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试图展现传播的社会权力关系。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北美、欧洲以及第三世界国家都颇有影响,它和起源于英国、着重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大众文化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文化研究一道,被认为是1970年代以来批判传播研究的两大主要面向。

在北美和欧洲,学术界基本上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同于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在第一本传播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加拿大学者莫斯科(Mosco,1996)详细介绍了多种政治经济学派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莫斯科认为,政治经济学理论非常宽泛,涵盖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右翼新保守主义到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在内的批判政治经济分析。但莫斯科在论述传播政治经济学时,强调从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立场出发,研究社会权力关系与传播生产、流通、消费的相互建构。本章认同莫斯可的观点,把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同于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将其置于批判研究的一般学术取向与背景之中,而后在此基础上评述本领域的研究起源、主要观点、研究模式、代表人物及著作、争论焦点和学术前沿。

批判研究中的传播政治经济学

鉴于此,在讨论传播政治经济学之前,我们有必要描绘一下西方传播学研究的两大分野:主流研究,又称行政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和批判研究(critical research)。莫斯可(1996:247)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称为传播学的“主要断裂线”之一。尽管这种划分过于简单,但它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和描述意义。具体而言,美国传播学研究史上的两大事件对于这两派阵营的划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第一,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于1941年发表了《关于行政和批判传播学研究》一文,首次指明了两者的区别。第二,《传播学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于1983年出版了一期特刊,凸现了传播学研究领域两大阵营的对立,确定了双方随后发生的辩论框架。

传播学研究源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色彩浓厚的大众说服和宣传研究,其中包括了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1927年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争宣传研究(Mattelart,1994:66)。同时,产生于美国本土、以杜威(John Dewey)为代表的实用主义传播观与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研究,尤其以帕克(Robert E. Park)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批判”(liberal criticism)的实证研究,也一直关注“媒体与民主之间的冲突关系”(Mattelart,1994:67;另见D. Schiller,1996)。然而,如本书第3章会进一步论及,二战以后以及冷战期间在美国社会科学界立足的传播学研究基本上把美国的主流自由多元主义(liberal pluralist)意识形态和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作为隐性的理论前设,采用定量方法,通过大规模的调查和统计分析以研究不同媒体如何影响受众行为,努力使研究表现出超政治价值和科学性的同时,与选举政治或商业营销相关联。

与此同时,在1930年代后期,从纳粹德国到美国的一批犹太学者——他们后来被称之为“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研究取向与方法。这批学者包括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人,他们接受的是欧洲的思辨哲学与解释性学术传统,并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曾经受到法西斯主义磨难的经历使他们对美国文化工业的兴起及其反民主的倾向相当警惕。鉴于纳粹利用广播进行法西斯宣传,他们想到美国的大众媒体是否也起到助长法西斯主义倾向的作用?因此,他们提出一个问题:法西斯是否也在这里(美国)发生?而当时美国的一些学者认为,美国的自由多元主义是存在的。为此,他们做实证研究,了解受众是如何接受广播信息的,而其结论就是“有限效果论”和“二级传播理论”。

因此,实证研究尤其是受众效果研究,除了适应商业和政治选举方面的应用需求外,还有一个隐含的政治背景:证明法西斯主义不会在美国发生,相反,自由多元主义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Hall,1982)。正是在这样的严肃政治分野前提下,拉扎斯菲尔德发表上文提及的文章,阐述美国的实证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根本学术分歧。他把这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称之为“行政的”和“批判性的”研究。按照拉扎斯菲尔德(1941:8)的说法,行政研究“服务于某种带有公共或私人性质的行政机构”。行政研究学者把媒体看做是有用的工具,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暴露于不同媒体的是哪些人?他们具体偏爱什么?不同的表现方式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但拉扎斯菲尔德也承认,行政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无法充分说明历史,解决的是一些一般意义上的具体问题。相比之下,批判研究聚焦于媒体在社会体系中的普遍性角色,关注人类的尊严和价值观所面临的威胁。批判学者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媒体如何被组织和控制的?在媒体建制中,集中化、标准化和政治与商业营销压力这些趋势是如何被表达的?不管如何被掩盖,这些趋势正在以何种方式威胁人类的价值观?批判研究以社会研究为出发点,也就是说,把传播学置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研究,从而提出规范性的价值观,以此为依据来评价实际和期望的传播效果。

概括而论,传播学的批判研究具有以下六个相互关联的特点:

第一,从研究命题看,批判研究一般集中研究传播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强调历史感和对宏观社会背景的分析,集中研究媒体体系的所有权和控制,媒体结构、意识形态、意义和身份认同与其他大的社会结构的关联,以及对传播制度和文化结构层面的分析。如本书序言所示,批判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即在各种社会背景下考虑传播与文化实践。他们认为,抛开社会理论就不可能有传播与文化理论。虽然不着重分析媒体对个体的影响力,批判研究并非忽略个体。他们把个体看做是由社会权力结构所决定的群体成员,在此基础上探讨个体所处的被支配地位和他们的抗争。因此,批判研究的分析范围要比经验学者宽泛得多。

第二,在对社会权力的理解上,批判研究认为社会权力是双向的和多维的,涉及显性的行为影响和隐性的意识形态等不同维度,而且其分配是不平等的。在他们看来,社会关系模式是基于冲突(斗争和差异),而不是一致和共识。正如伯列(Bailie,1997:33)所说,“批判研究根植于这样的假设,即社会制度和人类关系是历史、权力和斗争的关系”。当行政研究从“线性因果模式”(Linear model of causality)出发研究广告对受众行为,尤其是购买行为的影响时,批判研究却探讨广告的历史起源,哪些利益集团在利用广告,广告如何将媒体、受众和资本主义制度绑在一起的,以及广告关于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宣传对人类社会价值体系和生态所产生的后果(Jhally,2000)。批判研究反对自由多元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关系的看法。后者认为,权力可以被不同社会群体平等分享,而国家在其中保持中立的裁判员角色。

第三,从方法论上看,批判研究并不拒绝采用实证方法,但认为问题的相关性与重要

性比技巧的无可挑剔更重要。批判研究认为自己的优势来自于对所作研究的重要性的意识,而重要的理论表述不一定非要通过数据来验证。正如麦克斯韦尔(Richard Maxwell, 2003:37)引用芬兰学者诺顿斯登(Kaarle Nordenstreng)所说,“现实的某些方面确实可以通过实证来测定和被量化阐述,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些必然是我们所要理解的现实的最基本方面”。

第四,在选择和对待研究问题方面,批判研究不讳言学术研究是以价值观或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作引导的(Mosco, 1996)。他们的研究强调知识的批判性力量,旨在通过弱化和消除统治性的权力关系(relations of domination),建立起一种公平正义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第五,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取向方面,批判研究或多或少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遗产,并从不断发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营养。批判研究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重视有关决定论的辩论和如何界定文化的问题,认为倘若抛开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则无法对文化传播和实践进行研究。

第六,批判研究不仅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而且把研究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主张通过研究影响社会,改变现状。因此,批判学者“做研究是为了推动对现有世界体系的批评,并促进它所‘批判的状况’发生改变”(Mosco, 1983:245—246)。批判研究致力于提供可能导致积极社会变革的知识力量,为个人和群体的解放创造知识文化资源。

传播政治经济学:学术起源和发展

传播政治经济学兼具批判学派的上述特点。它传承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学术精髓,试图将传播现象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来研究,探讨媒体和传播体系如何强化、挑战或影响现有的阶级与其他社会权力关系。与行政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对传播制度和传播生产问题的研究取向相反,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心任务之一是“研究资本的逻辑是如何塑造文化工业的结构与内容的”(Bettig, 2002:84)。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政治经济结构性因素与劳动过程,尤其是经济因素对社会传播关系的影响,审视媒体所有权、资助机制与国家政策对传播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的影响(McChesney, 2000)。在更广义的层面上,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1)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2)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D. Schiller, 1999:90)。

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它不是对这一理论生搬硬套的结果,也不是抽象学术的产物。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起过程中,有两个具体因素不可忽视:(1)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反法西斯主义理论与实践;(2)20世纪五六